

清华科技与社会丛书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摇组编

相对主义：从典范、 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

王摇巍摇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摇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分析相对主义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如“典范”、“语言”、“理性”等,尝试从根本上来说明相对主义是不成立的。首先“典范”不是拉卡托斯所理解的“硬核说”式的,而可以是其要素间具有“家族相似性”。所以典范是可供我们学习的范例,而非阻碍。其次,语言之间“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沟通的彻底崩溃。真正的双语人可以实现跨典范的理解,语言内部的创生能力也能够克服“不可翻译”。最后理性未必是层状结构,而可以是网状模型,所以价值观层面的争议也可以理性地讨论。而且理性概念所蕴含的批判性,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典范始终进行批判反思,并使之更具开放性。作为案例研究,本书也讨论了中国科学的传统、语言与理性等问题,并和西方科学传统做了比较研究。

本书主要面向涉猎哲学领域的工作人员以及有相关学术兴趣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 轱巍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清华科技与社会丛书 轱国屏主编)

陈丹岸 陈丹岸 陈丹岸 陈丹岸

I 援相...摇 II 援王...摇 III 援相对主义 原研究摇 IV 援月 原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0000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编 100084)

策 划:轱增曾 陈丹岸 陈丹岸

责任编辑:方摇洁

印 刷 者: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60mm×230mm 1/16 印张:2.5 插页:0 字 数:20千字

版 次:2008年 01月第 1版 2008年 01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陈丹岸 陈丹岸 陈丹岸 陈丹岸· 陈

印 数:1000~1000

定 价:15.00元

作者前言

一、问题的缘起

摇摇《相对主义：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一书，是根据我在 1987 年 1 月至 1991 年 1 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攻博四年期间，所写的博士论文《从典范、语言和理性的观点看相对主义》修改而成。

研究起源于问题。我选择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这一问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因为它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但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产生，主要来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观点在于否定科学中的绝对“客观性”与“理性”，认为客观性与理性都是相对于典范(典范)(或世界观、文化、传统、话语、视角)而言的，因此不同典范之间是不可比较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利，一样地好。

逻辑实证主义是 19 世纪二三十年年代活跃于维也纳大学的一批学者提出的，它的核心人物有石里克(Stenius)和卡尔纳普(Carnap)等人。他们从主张“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反对传统思辨哲学(思辨哲学)出发，进而将研究的兴趣专注于科学，最终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他们的哲学观点，不仅在哲学界大行其道，而且很受科学家的欢迎，有“正统哲学”或“标准观点”之称。

但是，用逻辑分析的办法来处理所有的科学哲学问题，显然是不充分的，会遇到很多逻辑困难。由于逻辑实证论强调用清晰的方法表达思想，因此他们的错误也以非常明显的形式凸显出来，遭到了后人的批评。

例如，蒯因（Quine）批评了逻辑实证论两个教条：（员）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二分法，分析命题的真值来自于意义，与事实无关，综合真理则来自于经验事实；（圆）还原论，每个有意义的命题都等价于一些术语的逻辑建构，而这些术语可以指向直接经验，即有意义的陈述可还原为直接经验。

逻辑实证论的“意义标准”也受到了挑战。由于具有难以克服的逻辑问题，逻辑实证论的“意义标准”从“可证实原则”改为“可证伪原则”，最终进一步放宽至“可验证原则”。但“丘奇公式”（Church's Thesis）的出现，却使得“可验证原则”也难以实现。于是，意义标准从“可检验标准”发展到了“可翻译标准”，并最终由亨普（Hempel）提出了“网络结构”，认为有意义的不是单个的科学理论，而是整个理论体系。

是否存在中立的观察语言的问题，还牵涉到“可翻译论旨”。根据这一论旨，相互竞争的理论可翻译为中立的观察语言，由中立的观察语言来检验理论的真假；或者旧理论可以完整地翻译为新理论语言，在新理论中得到完整说明，即旧理论可以视为新理论的某种极限形式。然而，“观察—理论”的二分法受到了波普（Popper）的批评，他认为“观察渗透着理论”，因此没有先于理论的中立观察。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Quine's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以及库恩（Kuhn）的“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更是直接否定了“可翻译论旨”。

逻辑实证论主张用逻辑语言或人工语言作为普遍语言，来分析和规范自然语言。并且将传统哲学的谬误归咎于语言的不合逻辑地错误使用。逻辑语言作为普遍语言或规范语言的观点，后来被原创者之一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本人所抛弃。他提出了“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的概念，认为逻辑语言只是诸多语言游戏中的一种，不能涵盖所有的自然语言。

逻辑实证论者希望用科学方法来说明科学的理性：符合科学方法的就是理性的，不符合科学方法的就是非理性的。卡尔纳普试图用归纳逻辑来作为科学方法：对于给定的证据，归纳逻辑可以计算出证据对

理论的支持程度。但古德曼(亨德里克·路易·范·德·格罗特)的“绿蓝色(即逻辑论证)”表明,用“验证程度”来建立归纳逻辑的办法未必能够成功。波普否认归纳法在科学的作用,并且承认科学发现“没有逻辑的通道”,但他将“假说否定法”视为科学验证的方法。“杜桓—蒯因论旨”(厄内斯特·索森)则否认,单个假说可由观察所否证。在缺乏了科学方法之后,还能怎样说明科学是理性的呢?

逻辑实证论的理论困难,为种种“后实证论”(伊姆雷·拉卡托斯)思潮尤其是相对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劳丹(德特勒夫·范·拉丹)称逻辑实证论为相对主义的“先辈的原罪”(奈廷·奈廷·奈廷)。

库恩在1970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塞顿·库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本历史主义的代表之作,最初是从科学史的角度讨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但特定的历史背景却“时势造英雄”,使之成为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并使相对主义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二、典范与相对主义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提出了“典范”的概念。“典范”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很远。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用它来指理念(即理想)作为实物的榜样,我们所画的圆就是将理想中的圆作为典范,模仿而成。在英文中,一个“典范”就是公认的模式或模式。它经常在文法中,用来表示词形的变化规则,有重复套用的意思。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李希腾堡(即尼尔斯·玻尔)在1929年用这个概念说明科学是有结构的。维特根斯坦也提到了这一概念,他把存放在巴黎博物馆的铂制米原尺,作为长度计量的“典范”。

库恩在使用“典范”概念时,定义得比较含混。它大致可以包括:(一)符号通式,即科学概念或术语,如牛顿力学的云云;(二)共同信念,它包括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如近代科学相信所有自然现象都是微粒运动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或是理论模型,如把电流想像为水的流动;

(猿)共有价值 科学共同体培养了科学家共同的鉴赏力,如用简单性、一致性、精确性来判断理论的好坏;(源)范例,例如普通物理的老师用演示实验来表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

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在“典范”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典范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但他认为,拥有不同典范的科学家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因此“典范转移”就像宗教皈依(悦)或心理学的格式塔(源)转变,要么一成不变,要么彻底转变。

伴随“典范”概念而来的还有“不可通约”概念。“不可通约”一词最初来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孕)发现勾股定理之后,很快又证明了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其直角边,找不到某刻度的尺子来共同测量。因为等腰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的比为圆的开方,不能写成分数(皂)的形式。

库恩借用这个词来表示,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低。“不可通约”之意思可以分析为三个层面:(员)科学标准的不同(如什么是科学的问题);(圆)概念的变迁(相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含义);(猿)世界观的差异(要么一成不变,要么整个转变)。

“典范”及“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逻辑实证论虽然通常更喜欢用“主体间性”(泽)来取代“客观性”,并且把实在论这一类的讨论当作形而上学,存而不论。但逻辑实证论的观点还是比较偏向实在论。而且按照逻辑实证论的想法,科学发展过程是科学理论的不断积累,其实预设了科学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真实描述,科学的发展就是对经验世界的真实描述不断累加。

波普虽然以“不断革命说”取代了逻辑实证论的“累积说”,但他仍然保留了“逼真性”(灾)这一概念:新的理论比旧的理论更加逼近真理。因此,科学仍然可以视作对实在世界的客观描述。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更是充分表达了他对“客观知识”的信仰。

但库恩的“典范”概念,却对“客观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如果科

学发展是典范发展与典范转移交替进行,而典范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那么我们如何说明新理论才是对实在的客观描述?会不会旧典范更符合实在呢?例如古希腊的“原子论”曾经长时间地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所压倒,却在近代化学中重新复苏。谁能保证我们今天的科学典范才是客观实在,将来不会被新的典范所取代呢?

科学的“理性”也在“典范”、“不可通约”概念的冲击下,出现了问题。因为“不可通约”概念否定了跨典范理性比较的可能性。首先,语言上的不可通约就阻碍了跨典范的沟通;其次,评价上的不可通约也否认了不同典范拥有同样的标准或价值观,可能按各自的标准各有各好,最终无法比较;最后,如果不同的典范是不同的世界观,但没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观来作为绝对参照系,那么所有的典范或世界观都具有同等权利,无法做出理性的选择。

因此,诺特丹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主任麦克穆林(穆林承认)在“理性”的问题上,“三十年后,《科学革命的结构》仍给我们留下了议程。”

库恩对科学的“客观性”与“理性”的挑战,促使了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的兴起。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客观性”与“理性”,客观性与理性都是相对于典范(或世界观、文化、传统、话语、视角)而言的,因此不同典范是不可比较的,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利,一样地好。

三、问题的意义

相对主义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教授、美国《科学哲学》杂志的主编考特格(考特格)将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种思潮称为科学哲学的“新纪元”。其实这些新思潮都涉及到相对主义的问题。

建构论又可称为“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它与捍卫科学客观性的反建构论主要分歧就在于: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还是科学

共同体的建构。建构论认为所谓的科学知识,也就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因此,科学知识的建立,就是相信这一理论的科学学派战胜反对派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并不是客观的、必然的,而是偶然的、社会性的。如果反对派别的人数更多,效率更高,在争论中占了上风,那么科学知识也就随之逆转了。

而反建构论者认为,科学研究中的社会因素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更多具有的是自然本性而非社会本性。某个科学家可能是为了教职或是金钱而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的社会建制在某些时候也可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但并不因此影响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呢?库恩的“典范”概念以及伴随产生的相对主义问题,彻底动摇了科学的“客观性”:既然不同的典范是不同的世界观,而典范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那么谁能保证现在的典范才是客观的,将来不会被新的典范所取代呢?因此建构论的产生,与库恩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有着密切联系,和相对主义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有独特的认知方式。这一认知方式虽然被占据科学主流的男性科学家所压制,但也帮助了女性科学家取得卓越成果。她们重视“阴性”价值,如主体性、合作、情感、移情等;主张为了女性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平等地位,不仅女性要改变,科学自身(如课程、实验室、理论、研究纲领等)也要相应变化。

女性主义的发展壮大,其实也和相对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按照传统科学哲学的观点,自然科学是对世界的惟一的客观描述,那么女性主义最多只能丰富科学研究的主题,但不会影响科学内容的客观性。相对主义否认了人类对世界可以有客观的、惟一的描述。既然没有了客观的“看”(澤爾),只有不同视角的“看作”(澤爾)。而这些视角之间又是“不可通约”,享有同等的权利。这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视角不同。女性主义为看待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理应和传统科学所提供的男性视角享有同等的权利,甚至可以作为男性视角的补充,从而深刻地改变科学的面貌。

曹天予把“后现代性”近似地概括为：“没有可用宏大叙事法描述的历史；因为经验的断裂，没有始终同一的个人；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没有作为表象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只是语言游戏自由地在权力关系网中游荡。”

库恩以及相对主义对于后现代哲学产生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曹天予认为库恩的“典范”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及科学探索的前提，进一步把历史的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之中。在他对“后现代”的定义中，“没有作为表象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都可以归功于库恩对“现代性”的批评。

科学哲学“新纪元”的三大思潮，都或多或少地与相对主义的问题相关。由此可见，相对主义确实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中心问题之一。

相对主义不仅仅是纯粹的科学哲学的学术问题，它甚至体现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亨廷顿~~ 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预设了相对主义的问题：不同文明的语言和价值观是如此的不同，因此既不能实现跨文明的完全沟通，也不能建立普遍适于所有文明的价值标准。所以文明间的差异不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而消除，而只能以冲突的形式来解决。

只要回顾近年来的南斯拉夫局势，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北爱尔兰问题，魁北克公决等，都是文明冲突的最好注释。当然，最突出的是1995年的“~~圆顶~~ 圆顶事件”，它凸显了阿拉伯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由此可见，对相对主义的克服，并不只是纯学术的研究，它也能对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四、本书的内容与贡献

本书的第一章“导论”介绍了相对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以及克服它的现代意义。承认库恩对逻辑实证论的批评是成立的，但却未能接受其相对主义的结论。因此试图通过分析“典范”、“语言”和“理性”

等基本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本书的第二章“从典范的观点看”,仔细地分析了库恩所提出的“典范”概念的性质。相对主义通常把“典范”看作是有本质属性的理论体系,或如拉卡托斯(陈启茂译)所理解的“硬核说”式的,从而强调了“典范”的整体性、规范性。但这样的理解忽视了“典范”概念的示范性、开放性、发展性。

笔者批判了对“典范”概念的“硬核说”式的理解,认为某些要素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陈启茂译),而被认为属于同一个典范。“家族相似说”是维特根斯坦提出来反对“本质论”的,引入这样的理解可以更为突出“典范”概念的示范作用,从而使得典范不再是铁板一块、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开放的、可发展的。

“家族相似说”也使我们回到“典范”概念的原义——“示范”的意思,因此典范是可供我们学习的范例,而非阻碍。典范转移也未必是彻底变革,而可以在革命中有所继承。所以本书按港台的译法,将库恩的译作“典范”,而不是内地通行的“范式”,就是为了突出“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非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

其次,本书的第三章“从语言的观点看”,仔细地讨论了科学哲学的语言观,并处理了“不可通约”的概念。引入了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如索绪尔(洪堡特译)和乔姆斯基(陈启茂译)以及洪堡特(宰桑译)的语言哲学,批评了逻辑实证论的语言观,从而使得库恩的“不可通约”概念及其理论意义更为彰显。

但语言之间的“不可通约”并不意味着库恩所说的跨典范沟通的彻底崩溃。借助人类的普遍语言能力,真正的双语人可以实现跨典范的理解。此外,现代语言学确认了语言内部的创生能力,这一能力可以用语言创新的办法来克服“不可通约”的问题。

最后,本书的第四章“从理性的观点看”,分析了“理性”的概念。根据工具理性的观点,我们只能评价手段的理性与否。这样的评价体系是层状的:上层的(如价值观)可以评价下层(如方法论和理论),但反之不然。因此价值观的比较只能是相对的,非理性的。

笔者同意劳丹的观点,认为“理性”未必是层状结构,而可以是网状模型。不仅上层结构可以理性地评价下层,反过来,方法论和理论也可以理性地评价上层的价值观。因此即使在价值观层面的种种争议也可以用理性加以解决。而且“理性”概念中蕴含的批判性,也有助于始终对自己的典范保持反思批判的态度,使之具有开放性。

综上所述,本书在第五章“结语”中表明,相对主义经过哲学的概念分析之后,最终是不能成立的。

作为案例研究,本书也讨论了中国科学的传统、语言与理性等问题,并和西方科学传统作了比较研究。

目前,国内对相对主义的问题还较为忽视,缺乏系统的讨论。据笔者所知,国内还没有关于相对主义的专著。另据《中国期刊网》从1989年至2004年的统计,以“相对主义”为关键词或篇名的核心论文只有100多篇。而且这些都侧重于文化批判,没能作深入的哲学探讨。因此本书所做的工作,在国内是属于开拓性的。

据马基斯和奥尔德雷普的统计,国外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伯恩斯坦(1984年)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1984年)、牛顿·史密斯(1981年)的《科学的理性》(1981年)、劳丹的《科学与相对主义》(1981年)和《超越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1981年)、霍里斯(1981年)和威尔逊(1981年)编的《理性与相对主义》(1981年)和威尔逊(1981年)编的《理性》(1981年)等。

伯恩斯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学部分,没有完整地处理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牛顿·史密斯和劳丹的研究虽然专注于科学哲学,强调科技史的实证研究来反对相对主义,但未能对相对主义的基本概念在哲学上作深入分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法。至于霍里斯和威尔逊所编的文集,更是有许多哲学家如文区(1981年)、麦肯泰尔(1981年)等同情相对主义的立场。

因此本书所作的对相对主义问题的全面分析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很有新意的。尤其是把“典范”分析为“家族相似性”,并从语言的创生能

力来说明“不可通约”可以克服,以及将“批判性”概念引入“理性”,这些都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但由于笔者能力所限,论文的论证仍然不够充分、有力。而且由于我的博士论文与书稿都完成得较为仓促,以致本书的结构还不够清楚,语言表述也有待改进。正如海德格尔的名言“不是著作,是道路”。本书不是对相对主义问题的终极答案,而是非常粗略的阶段性的成果,希望可以为解决相对主义提供有用的启示与素材。

如麦肯泰尔所言:“因为相对主义就像怀疑主义一样,都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推翻了好多次的理论之一。如果一个理论包括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真理,可能没有比它在哲学史上一再地被推翻更可靠的标志。真正可被推翻的理论只需要被推翻一次就足够了。”相对主义问题的克服,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而可能是一项可以媲美柏拉图、康德哲学的庞大工程,需要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科学哲学与心灵哲学、语言哲学等多学科的整合。本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总结,如果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将是世界哲学史上的重大突破。

五、致摇摇谢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何秀煌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也正是他给予我机会进入宏伟的哲学殿堂。何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给予了特别细致的指导。因为我写作能力欠佳,我的初稿上经常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的批改。何先生不仅是港台地区较早介绍西方逻辑学的知名学者,还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和文学学院院长。他在学术管理以及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也是很令人钦佩的。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攻博期间,我有幸得到石元康教授的指点。我听过他的“西方现代哲学专题:理性与相对主义”、“伦理学”、“历史哲学”等课程。石先生对我的研究风格和学术兴趣影响很大。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也正是想回应他所一直关注的问题。虽然本书没能给出很好的回答,但至少我一直在用心思考。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关子尹教授无论在做人与做学问方面,都予以我极大的影响。我曾经旁听过他的“西方哲学史”、“现代语言学研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课程,受益匪浅。也正是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成功地使我也变成了“书呆子”。

除了以上三位教授,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还有台湾大学的林正弘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冯耀明教授。两位先生对我的论文都提出了犀利而有力的批评。由于他们的批评指正,我修改了论文中的大量错漏之处,使得整篇文章略显体面了一些。

在港读书期间,周保松、陈日东、邓小虎、邓伟生等几位诤友,一直激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也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其他所有教师和同学,他们让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美好的时光。

本书的出版得到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我曾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得到寇世琪、曾晓萱、刘元亮等诸位教授的悉心指点、大力提携,使我得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训练,并有机会赴港深造。回校任教之后,曾国屏教授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并积极申请学术资助,使得我的博士论文得以顺利修改出版。

本书的出版得到“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北京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方洁等同志也为本书的付梓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王宏南、胡爱芬。他们不仅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教育我做一个人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信念。我愿意终身以此自勉。

目摇摇录

第一章摇导论·····	员
一、逻辑实证论的“原罪”·····	员
二、相对主义与科学哲学的“新纪元”·····	缘
三、克服相对主义的现代意义·····	怨
四、论文的结构和重要术语的澄清·····	圆
第二章摇从典范的观点看·····	缘
一、导论·····	缘
二、“典范”概念的哲学分析·····	远
(一)“典范”概念的由来·····	远
(二)库恩之“典范”概念·····	愿
(三)和传统的比附·····	圆
(四)典范的性质·····	圆
三、西方科学的典范转移·····	圆
(一)典范转移的历时性·····	圆
(二)科学革命中的继承·····	圆
(三)再论典范的性质——“硬核说”与 “家族相似说”·····	猿
四、作为典范的中国古代科学传统·····	源
(一)中国古代科学有无典范·····	源
(二)世界观·····	源
(三)方法论·····	源
(四)价值观·····	缘
(五)符号通式·····	愿

(六) 中国科学的典范转移	缘
五、小结	缘
第三章 从语言的观点看	缘
一、导论	缘
二、逻辑实证论的语言观	缘
三、“不可通约”概念的分析	远
四、批评与回应	缘
五、现代语言学的观点	苑
(一) 索绪尔的语言学	苑
(二) 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	苑
六、洪堡特的语言哲学	苑
(一) 洪堡特论语言	苑
(二) 洪堡特论汉语	缘
七、小结：语言的隔绝	愿
第四章 从理性的观点看	愿
一、导论	愿
二、理性与相对主义	愿
三、对待不同文化的诸多看法	愿
四、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批评	愿
五、“理性”概念的分析	愿
六、理性的“层次结构”和“网状模型”	愿
七、中国古代科学中的理性	愿
八、小结	缘
第五章 结语	苑
一、“典范”概念是否导致相对主义	苑
二、文明冲突抑或学习	苑

三、彻底冲突的典范	员藪
四、回顾与展望	员藪
附录张东荪论汉语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影响	员藪
一、语言与基本关怀	员藪
二、哲学思想	员藪
三、范畴理论	员藪
四、语言与逻辑	员藪
参考文献	员藪

摇

献给我的父母

——王宏南和胡爱芬